

中国小说史丛书

晚清小说史

欧阳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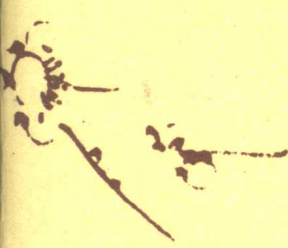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丛书

晚清小说史

欧阳健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庆惠
封面设计 凌瑛如 刘 炜

晚清小说史 欧阳健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00000 印数 0001—5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18-367-8/I·232 定价:19.00 元

“中国小说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刘世德	邓绍基	林 辰	袁世硕	章培恒
主编	安平秋	侯忠义	萧欣桥		
编委	宁宗一	安平秋	齐裕焜	张 俊	杨 忠
	陈美林	陈庆惠	欧阳健	侯忠义	曹亦冰
	黄 霖	萧欣桥	萧相恺		

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八种，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著）；隋唐五代小说史（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晚清小说史（欧阳健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陈熙中著）；世情小说史（向楷著）；神怪小说史（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苗壮著）；传奇小说史（薛洪勤著）；话本小说史（萧欣桥等著）；章回小说史（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四种：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著）；中国小说文化史（黄清泉等著）；中国小说艺术史（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断代史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

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小说史》的伟著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1997年6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晚清新小说的发轫（1902—1903）	10
一 梁启超——晚清新小说的旗手	10
二 《新中国未来记》——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 ...	18
三 《新小说》中以外国历史为题材的改革小说	30
第二章 晚清新小说的第一个高峰（1903—1905）	48
第一节 李伯元及其主编的《绣像小说》	48
一 李伯元的文学之路	48
二 《官场现形记》——改革背景下对官僚体制 的谛察	57
三 《文明小史》——西方文明的引进与抵制	90
四 欧阳钅元与第一批“新党小说”	107
五 呼吁变革社会习俗的“醒迷文”	113
第二节 吴趼人和他的代表作	125
一 吴趼人是怎样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	125
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新的改革眼光 对社会现实的全方位扫描	132
三 《新石头记》——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 的介入和超越	142
第三节 刘鹗	156
一 刘鹗的生平	156

二	《老残游记》——爱国志士对于改革维新 的深层思考·····	165
三	《邻女语》——一部和刘鹗有关的小说·····	180
第四节	曾朴·····	187
一	曾朴的生平和《孽海花》的成书过程·····	187
二	《孽海花》——一代名士从晦蒙否塞到 开眼世界的三十年心路历程·····	198
三	傅彩云的配角地位和《孽海花》难以终篇 的内在原因·····	216
第五节	蔡元培 旅生 姬文 顾琐·····	225
一	《新年梦》——思想家对未来中国的向往·····	225
二	《痴人说梦记》——以正面理想人物为中心 的长篇小说·····	230
三	《市声》——民族资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 的心声·····	240
四	《女狱花》《女娲石》《黄绣球》 ——对“中国女豪杰”的呼唤与想望·····	252
第六节	黄小配及晚清革命派小说·····	266
一	晚清革命派小说的爱国主义主题·····	266
二	《仇史》与《洪秀全演义》 ——两部取材于清代史事的讲史小说·····	277
第三章	晚清新小说的第二个高峰（1906—1909）·····	290
第一节	吴趼人及立宪、新党小说·····	294
一	立宪小说——改革的深化及其面临 危机的记录·····	294
二	《上海游骖录》与《发财秘诀》 ——对传统道德的深切呼唤·····	300

三	后期“新党小说”——对晚清改革前途的痛苦预测·····	308
第二节	黄小配的近事小说·····	315
一	《宦海潮》——中国对外开放的“纲鉴”·····	315
二	《大马扁》——攻击政敌的派性小说·····	321
三	《宦海升沉录》——革命清议的《春秋》·····	324
第三节	陆士谔·····	333
一	陆士谔的生平·····	333
二	《新三国》——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清醒抉择·····	335
三	《新水浒》——对社会经济改革的超前描摹·····	346
第四章	晚清新小说的余波（1910—1911）·····	357
一	从《新中国》到《血泪黄花》——晚清改革终结的历史见证·····	358
第五章	晚清时期的其他小说·····	373
一	传奇异书《笏山记》·····	373
二	言情佳构《剑花洞》·····	382
三	讲史新篇《吴三桂演义》·····	390
余论	·····	399

引 言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以来，“晚清小说”这个概念便为多数学者所沿用（日本学者则多称作“清末小说”）。据《辞海》释义：“晚，时间上将近终了。如当晚；春晚；晚年；晚明。”所谓“晚清”，自然是指清代的末期。但具体落实下来，这一时期究竟从何年何月开始，以何种重大历史事件或何种重要小说作品作为划分的标志，人们其实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通常的做法，是将1840年看作这一时期的开端，以便与历史学家所划定的“近代时期”相一致；还有人索性将所谓“近代小说”看作晚清小说的同义语，或者将晚清小说看作下限迄于1919年的“近代小说”的组成部分。这些看法其实是很值得讨论的。

首先，作为历史学上的名词，“近代”云云，并不能算作严格的科学概念。站在历史长河的某个时间座标，诸如公元1995年的今天，回首那尚不遥远的1840年，称它一声“近代”，自然并无不可；但以永恒的历史的眼光看，使用具有相对意义、时限性极强的“近代”这样的概念，就不免失却确定的涵义。

其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学创作、小说创作都有其自身特有的步伐和规律，不一定和历史（这里主要指的是政治史、经济史之类）的发展完全契合。文学史研究工作者，虽然不可能一一重新审视、核验历史学家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所有结论，但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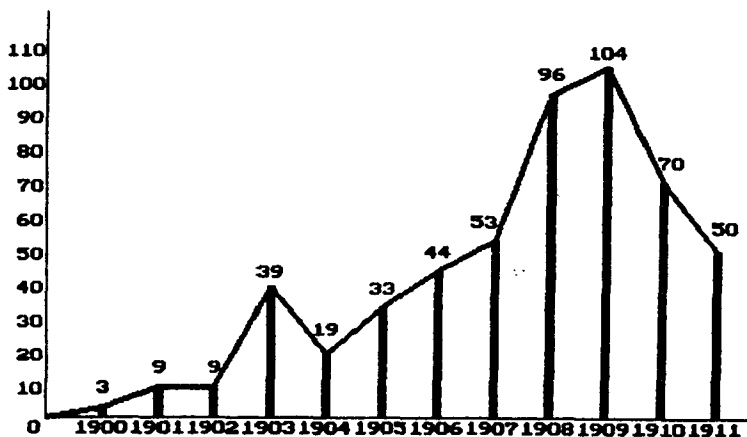
权在自己驰骋的领域里,根据所掌握的客观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出独立的判断。面对丰富纷繁的晚清小说的客观存在,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去探索晚清小说的本质和演变进程,不能机械地用史学家划定的近代史(1840—1919)的框框去套晚清小说,简单地把在这一时期或这一阶段内由许多各不相干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小说,一概笼统地称为“近代小说”。

从中国政治史看,1840年的鸦片战争确实可算是一个重要的界碑。随着西学的输入,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散文诗歌创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变革;但中国小说创作领域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闻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一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2部,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年中,却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48部。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前六十年的作品依然是传统型的,如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与古代的小说没有本质的区别。惟此之故,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由此可见,在这一为史学家划定的“近代史”范围内产生出来的小说,确实并不具备“近代”的“精神”。

那么,为什么到了1901年以后,晚清小说才骤然繁荣起来呢?文学史家一齐把目光投向了上一年发生的“庚子国变”。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战,亦屡挫于外敌,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愆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

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①鲁迅把眼光投向庚子（1900）以后，以为小说创作至此而“特盛”，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其时是否因为“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而导致小说创作繁荣，则需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自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中国之屡挫于外敌，最突出的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败，1857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败，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之败，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之败，等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为后盾，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领海等主权，使中国人民陷于黑暗的深渊。1900年的庚子国变，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大肆烧杀抢掠，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确实是一场浩劫；但比起以往的劫难来，并无本质的不同。从表现形态看，它不过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奔热河的悲剧的重演，而从所引起的社会心理的震动来看，它也不及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来得强烈。庚子国变的直接结果，并不是熄灭了“有识者”心头使中国臻于富强的希望，相反，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革时期的来临，也酿就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为了说明问题，试将1900—1911年十一年间通俗小说创作的数量逐年列图于后：



据上表，十一年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03年（39部，为1900年的13倍），一次是1907—1909年（1909年有104部，为1904年的5.5倍，1900年的34倍）。追寻这两次高峰出现的根由，就可以找到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

先来分析第一次高峰。1900年，共有3部小说（实际上有版本根据的只有两部），等于前六十年的平均值。其中一部为《中东大战演义》，写中日甲午之战，相当于时事小说；另一部为《泪珠缘》，则是典型的传统才子佳人小说。1901年共有9部小说，除《杭州白话报》所刊《波兰的故事》《菲律宾民党起义记》《美利坚自立记》《檀香山华人受虐记》《俄土战记》为篇幅较短之外国历史小说外，大部头的《野草闲花臭姻缘》《宜兴奇案双坛记》《潘查斗胜全传》《仙侠五花剑》，都毫无新意可言。到了1902年，情况就开始有了变化，除《李公案奇闻》为传统型小说外，其余8部如《新中国未来记》《洪水祸》《东欧女豪杰》等，都已强烈地透出新时代的气息。1903年的39部，几乎全是

新型的小说。也就是说，这一年的小说创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确实实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事实提示我们：在1901—1903年间，一定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变的发生，因而影响了小说自身演进的轨迹。

那么，这个历史性事变是什么呢？就是清廷自1901年开始的改革。清廷的改革决心，可以说是以庚子国变“巨额之代价”换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沉，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者也。”^②庚子国变造成了全民族的灾难，加重了全民族的危机感，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最高统治者，经历了播迁逃亡、豆粥难求的苦难以后，以巨额代价，增一层见识：“时经大创后，太后已恍然于国家致弱之原因，知此后行政之方针，不能不从事于改革，以图补救，乃以决行新政之谕旨，布告中外。”^③这里指的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以光绪名义发布的谕旨，其中说道：

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来，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

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语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再行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④

这道谕旨，对“祖宗成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然号召效行西法，且对只学西法“语言文字制造器械”等皮毛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的方针，显得颇有生气，绝不可视为套语具文。这道谕旨的颁布，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从此，清政府在其最后的十年中，主持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改革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奖励留学、扩展新军、兴建铁路、发展实业、改革法制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等，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领域，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俗发生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挺进的重大变化。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说：“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慈禧太后的改革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改革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苟延残喘，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对于她的动机，自然是不必怀疑的；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跳出对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就应该承

认，她所主持的，确实是一场改革运动。慈禧太后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时代之变，潮流之变，清政府施政方针不得不变的历史大趋势。惟此之故，“振刷精神，力祛积弊”、“实事求是，共济时艰”，已经成为当时谕旨和奏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用语。

同少数激进的改革派人士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支持下的戊戌变法之遭到顽固派强烈的嫉恨和反对不同，对于这次改革，只有少数人在私下里表示过某种保留。如有一位庚子事变中一直留在北京的仲芳氏，在光绪辛丑（1901）五月初十的日记中，提到连日由“行在”发来的上谕，认为这是“乱臣逆党，遂乘间进言，以强国强兵为辞，大率皆套袭二十四年康逆文章，以博忠谏之名，非变政，实乱政也”^⑤。这不过是少数顽固分子出于对情况的不了解而发的妄言而已。由煌煌上谕所确认的作为国策的变法维新，是以清王朝的最高统治的权威性、合法性为前提的，即使是当年参与扼杀戊戌变法的顽固派，也不敢抗拒这种潮流。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乱后思治，改革的决策自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梁启超在1901年10月所作的《维新图说》中提到，其时维新之语，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就反映了社会的普遍心态。对于改革的前途，当时许多人是寄予了希望的。有一篇题为《说败》的文章说：“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震旦新机，宜其绝矣，而维新之火焰不少减，反有挟浪乘风、披靡中原之势，是非所谓外形败而实胜耶？”^⑥

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

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正是处于改革的大氛围之中，晚清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飞跃。

首先，改革的要旨是“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以“作后事之师”，且号召“参酌中西政要”、“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思想的禁锢（这一禁锢对于刚刚镇压了康、梁变法的时代来说，是极为严峻的）被打开了，作家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了；同时，改革本身也使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因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新颖的素材，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文学的自由局面，文学观念的更新，这些都是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作为感应的神经，改革小说的涌现，乃必然之趋势。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①而这十年，同时又是剧变的十年，动荡的十年，各种思潮激烈撞击的十年，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为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土壤。要之，晚清小说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是二十世纪开端中国大地上自上而下开展的改革维新事业的产物，是广大新小说家在被严复称为“吾国长进之机”^②的改革形势下，对于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所交的一份爱国主义的答卷。因此，在论述晚清小说的时候，即便要采用“近代小说”这样的概念，也应该明确：所谓“近代小说”，不等于史家划定的近代史范围内的小说，而是指那些具有“近代精神”的小说。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